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效与展望

□ 王 凱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多个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应对好新形势和新挑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新的使命任务。

十年成效

“一盘棋”的区域功能格局更加清晰。围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总目标，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三省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分工格局日渐清晰。北京市立足“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积极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河北两省市分别围绕“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区域整体功能格局不断优化。

“一体化”的区域空间结构更趋完善。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和首都发展格局更加完善。京津“双城”联动引擎作用日益加强；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沿线人口产业集聚作用提升；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首都核心功能区综合服务能力 and 环境品质显著提升，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非首都功能并重阶段，北京城市副中心转向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新阶段，“一核两翼”发展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大重点领域协同发展更富成效。交通、生态、产业和公共服务四个领域“协同红利”持续释放，百姓获得感幸福安全感显著提升。交通方面，“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稳步推进，京津雄实现半小时可达，地级以上城市实现高铁全覆盖，京津冀内部联系更加广泛而紧密。生态方面，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较十年前下降约60%，区域生态环境品质逐年提升。产业方面，北京科技成果向津冀两地“就近转化”比重不断提升，中关村企业累

计在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已突破1万家。公共服务方面，越来越多的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持续延伸，教育、医疗、养老等协同发展成果正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新形势与新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期，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多重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转型、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2022年，我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京津冀地区同样进入了人口规模减少、老龄化加剧、总抚养比上升的新阶段。如何破解人口与人才的双重问题，成为京津冀地区不得不直面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正逐步呈现暖湿化，未来极端天气可能成为新常态，需要高度关注由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区域性灾害风险。

协同发展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新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尤其是随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一些影响区域协同发展和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协调机制时效性与政策精准度有待提升、实施推进不同步等问题都亟待破解。

路径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为高标准高质量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新目标和新要求，在持续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时，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阶。

第一，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强化竞争力、推进共同富裕为导向，培育高能级的增长引擎。一是突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引擎作用。保障“首都”核心，坚持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巩固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善之区。强化“新两翼”支撑，统筹北京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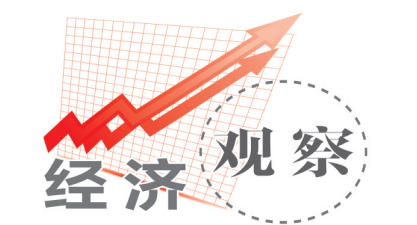
周边毗邻地区功能布局，推动首都功能的区域布局。二是突出重要经济发展廊道的引擎作用。做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轴线”，重点提升京津、京雄、京保石、京唐秦四条经济廊道人口、产业、创新等要素集聚能力，推动廊道沿线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做活沿海开放的“大平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环渤海经济区港口全方位合作和产业链群建设，打造开放型产业发展高地。三是突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引擎作用。提升平台能级，持续推动三省市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临空经济区等政策叠加、创新联动；提升枢纽能级，强化世界级机场港口群与枢纽城市、枢纽港站“三位一体”的系统建设；提升对外开放大通道能力，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区域协调互济的国际物流通道和综合货运枢纽体系，带动京津冀和北方腹地发展。

第二，坚持“率先突破”，统筹供给侧和需求端，持续深化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在产业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能力，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提升转化效能；打通链条的基础性环节，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四链”联动，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在交通方面，聚焦流量经济转化，推动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化“轨道上的京津冀”，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地区产业和公共服务功能融合发展，激活枢纽经济；联合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推动内陆物流枢纽建设，提升多式联运发展水平，激活区域物流经济；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和城市绿道系统建设，统筹沿线功能布局，激活区域绿色休闲和消费经济。在生态方面，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实施大规模国土空间绿化，提升区域绿色覆盖和碳汇储备能力，厚植区域绿色底色；构建区域魅力休闲体系，统筹提升绿色空间品质和多元服务功能，探索生态资源、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公共服务方面，聚焦群众可感可及，丰富和优化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第三，坚持改革引领，强化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加快推进协同发展的政

策机制创新，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加快在“全”的方面创新。突出全过程，完善“决策—协调—执行”的工作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突出全周期，健全“规划—建设—治理”全生命周期规划管理制度体系，提高规划协调性、实施同步性和监管有效性。二是加快在“实”的方面创新。面向基层实践，聚焦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堵点和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推动区域资源和要素配置路径创新，提升区域整体运营能力。三是加快在“精”的方面创新。强化区域政策时空动态适应，推动城市管理向区域适度延伸，提高跨区域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聚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在企业准入、人才流动、税费调节等方面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品质、安全智慧为导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建设宜居城市。主动应对人口转型需求，以建设更具人才吸引力的品质高地为目标，加快补齐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实施文化影响力战略，依托三地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区域文化整体性、脉络连续性和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积极营造新消费场景，提升文化消费转化能力。二是建设韧性城市。围绕应急、防灾减灾救灾等生命线系统建设新需求，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动多能互补的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建设，积极打造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融合基础设施体系，为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提供安全空间保障。三是建设智慧城市。顺应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变革趋势，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系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正确看待我国绿色竞争优势

□ 吕文斌 符冠云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尤其是光伏组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走出去”，是我国在能效、碳减排和成本效益等方面绿色竞争优势的必然体现，不仅适应了全球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而且为满足全球能源市场需求作出积极贡献。全球能源转型需要更多来自中国的优质产能，应当正视我国的绿色竞争优势，以更积极态度共同构建高质量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

我国新能源产业具有能效优、碳排放少、成本低三重“绿色竞争优势”，代表的是优质产能。新能源产品的“走出去”，是绿色竞争优势的体现，而非过剩产能的倾销。

我国工业产业体系完整现代，综合能效水平更优。经过多年的节能提效工作，先进高效技术装备大范围普及，能效水平稳步提升，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具体领域看，以电解铝、多晶硅为例，我国铝锭综合交流电耗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比北美地区低8%以上，比欧盟低11%以上；多晶硅产品能耗水平比全球除中国以外地区平均水平低10%以上。此外，我国是全球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国内大规模复合型产业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中间产品的仓储、运输等能源消耗，还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精细化分工获得更多效率红利。

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绿电规模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全生命周期低碳属性凸显。我国能源结构低碳化发展势头迅猛，“绿电”上规模上水平

为产业和产品脱碳创造条件。同时，我国还拥有全球输电能力最强、安全运行纪录最长的电网系统。不难看出，绿电规模大、利用水平高、电力保障能力强，使得“中国制造”具有非常明显的碳减排效益，真正做到了“用绿色能源生产绿色产品”。

我国发挥规模优势和网络效益，成本优势明显，有利于降低全球能源转型成本。我国已建成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规模经济、集群效益、基础设施配套叠加要素供给保障、劳动生产率较高等因素，共同塑造形成中国制造的综合竞争优势。我国新能源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网络，对能源技术变革也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我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中练就了真本事，持续为全球能源转型送去“源头活水”，“中国制造”将支持全球可持续能源转型。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背景下，全球对于新能源产品需求还将出现数倍增长，优质产能不但没有过剩，反而是远远不足。

我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展，中国的产能丰富了全球供给，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重要贡献。依托三重“绿色竞争优势”，全球新能源产业加速向我国集聚，而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提供强大助力。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接近500GW、风电机组超过80GW、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950万辆，大部分是满足国内能源转型需要，而非对外销售。在

此基础上，我国还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能源转型送去“源头活水”，2023年出口的光伏和风机产品可每年生产超过30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同时，我国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构建低碳发展“朋友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成为全球热销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各国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可靠、用得起的能源，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换挡提速，迫切需要更多优质产能供给。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个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频发、国际能源价格高位运行、脱钩断链风险上升，能源转型的步伐不仅不会放缓，反而会进一步提速。因此，当前新能源产品产能远远无法满足全球能源转型的市场需求。而在通胀背景下能源转型的绿色溢价又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可承受之重”，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又绿色、又便宜”的优质产能不但没有过剩，反而是远远不足，“中国制造”未来还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全球能源转型将创造巨大市场需求，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人才、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有一定优势，能够与我国形成有效对接。应放下“零和博弈”思维，探索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共同构建绿色高效的新

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共同分享全球能源转型的成果。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是由一次次技术研发、一次次市场检验、一次次产品迭代而造就的。世界并不需要中国减少产出，而是需要更多资金、技术和产品来加快能源转型和消除贫困。应客观看待中国新能源产业在能效、碳排放、成本等方面业已形成的绿色竞争优势，站在增进全人类福祉的角度，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推动技术、产业、人才等领域合作。

我国将坚定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高效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发挥规模效益，持续提升新能源的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专利和品牌保护，吸引外商在我国投资新能源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引导企业加大海外市场布局 and 产业链配套，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



受新冠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2023年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取得了GDP增速5.2%的成绩。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没有准确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更没有深刻认识到“发展才是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关键之举”，进而基于既有模式对我国经济持有一种静态、僵化的认知。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相对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模式，我国目前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202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8.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延续增势，保持了良好上升势头。从经济理论上讲，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加是一个经济体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这期间经济增长与运行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不相同的一些特征，反映在经济增速上，表现为速度有所下降，但质量与效益明显提升。从经济发展史上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国在经济转型期也都呈现出类似规律性现象：即人均收入达到8000—10000国际元附近，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左右以后，开始发生从工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同时经济增速也有所下行。这也是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过程。

我国经济已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要在于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已超过3.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212亿元，比上年增长9.3%。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各国专利申请排名中，我国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位居第12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我国在量子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的原创成果。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正式投产，C919大飞机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新三样”出口增速喜人。同样地，从经济理论 and 经济发展史上看，当一国转向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驱动力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也会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因为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主要反映总量，对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并不能精准度量。反映在速度上，这一时期经济增速反而进入一个下降相对趋稳的阶段，这一点已经被当今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实践所证实。

当前，我国正在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新一轮产业革命主要基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而产生，并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变化。一般认为，这一人类发展史的又一次重大跃升将主要推动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即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从数字化转型看，我国已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数字大国。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从绿色发展看，我国多年来投资清洁能源、光伏电池等领域，这些领域现在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特别是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2023年，我国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 冯俏彬

国。回想过去几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令人十分感叹开辟新赛道的极端重要性。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都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其产生与应用必将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破坏性创新”。这种“破坏性”在一些特殊时点上可能成为短期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在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一些波折。对这些问题怎么看，一方面需要基于历史经验和既有理论，另一方面更需要秉持放眼未来、把握趋势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

回首40多年改革开放的峥嵘历程，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每一次面对挫折和困难，总有一些人士对中国经济产生疑虑，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始终不绝于耳。但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都始终有战胜困难、不断前行的勇气与能力。正是这种勇气与能力，以及坚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我国经济才一路过关斩将，克服重重困难，从改革开放之初占世界经济微不足道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无限，前景十分光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这两条主线，对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外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的转型，保持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